

# 裂痕处的主体重建

## ——以三篇小说为例

□ 崔耕

的怪异产物。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浪荡子托马斯流连于无数女人的床榻间领悟了存在的真谛，昆德拉用了冗长的笔墨来书写他的发现：“‘我’的独特性恰恰隐藏在人类无法想象的那一部分。我们能够想象的，仅仅是众人身上一致、相同之处。个别的‘我’，区别于普遍，因此预先猜不出，估不了，需要在他者身上揭示它，发掘它，征服它……发现那百万分之一，并征服它，托马斯执迷于这一欲念。在他看来，迷恋女性的意义即在于此。他迷恋的不是女人，而是每个女人身上无法想象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使一个女人有别于他者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

我们完全可以说，昆德拉笔下的“百万分之一”的独特性”就是个无法归类于人类共性的那种不确定性，它构成了个体在世间的某种本质，也就是《且放白鹿》中李同芳教授无法从“倍思亲”中获得的那部分答案。作者程婧波野心勃勃，试图用一个并不算长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探讨大数据时代人类的存在本质和科技发展对人类的反噬，这种反噬包括用看似延长人类意识的方式让人的存在变得虚无。无论是昆德拉，还是程婧波，都不同程度地肯定了肉体的重要性。而对于肉体重要性的认知并非漫长历史中贯穿始终的定论，古今中外，都存在将肉身仅仅看成灵魂容器的历史，作为容器，自然就是可以替换和抛弃的对象。这种论调在宗教宣扬中尤为常见，而当代无神论者很难否认，肉身和灵魂确实唇齿相依难以割舍，就像信息学教授李同芳在用软件“复活”爱人的同时却难以真正“入戏”一样，他清醒地认识到肉身的重要性，无论是小说开篇写他体认到自己的衰老，还是他像观众一样沉醉于复活爱人的戏码，作者程婧波都在向我们强调这一点。李同芳从心底发出疑问：“肉身的消失到底带走了什么呢？植物神经中枢控制的基本生命活动停止了。大脑内部复杂的、隐秘的思维活动停止了。身体与真实世界的交互活动停止了。没有了肉身，意识便又去了哪里？”理工科出身的李同芳教授自然不会轻易相信灵魂永存的神话，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科学思维得到可能并不期待的结论——“‘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意识’的前提是肉身对环境的探查，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样的‘主观体验’。而再强大的人工智能，也不可能具有主观体验。就像是戏台上来来回回的各路角色，聊天机器人的对答如流，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正是肉体延伸出的“六识”带给个体的主观体验，让我们在寒冷的秋夜，拾起飘落在地上的落叶，或者是某个热闹的瞬间，突兀地回忆起多年不联系的旧友时，也会因为个体的差异带来感受上的天差地别。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携带着一本自身独特的词典行走于世，词典中那些带有不确定性的、属于个体的独特词汇，游离在大数据捕获的范围之外，它们无法被归纳和统计，也无法通过数据分析得到某个精准的结论，但它们才是诗意和故事生长的土壤，是人类存在的混沌区域，很有可能也是人类安放灵魂的真正所在。

### 《门就要开了》：审判背后的身份错位与重构

运气背到家的警察童彤某天撞大运抓住了一个足以让他扭转事业的毒贩，还未品尝到成功的愉悦，就在抓捕他妻子的时候心情变得五味杂陈起来：原来毒贩的妻子是自己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在审讯毒贩妻子黄菊英的过程中，关于她前半生复杂又坎坷的经历逐渐浮现，她的苦难遭遇，竟然跟警察童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刊的小说《门就要开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情节不算曲折，故事主要靠人物对话推动。小说中的对话真实、粗粝，带着直指人心的锋芒。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作者王刊在两位主人公的对话中引入了一段身份的错位与互换——原本是审讯者的警察童彤，在黄菊英将对话带人私人领域时，变成了被审讯的对象。这场身份的悄然转换，可以看作是小说叙述者童彤内心进行的一次关于个体命运与集体暴力的深度勘探，在黄菊英少女时期经历

的梦境除了追逐，还多了一层欲望的指涉。小说中有多处都谈到了童彤对黄菊英身体的欲望，从初中时期的朦胧好感，到重逢时的审判，在这个全身体制化和去性别化的场景中，警察童彤依然能注意到“套裙衬出黄菊英很好的胸部，健身裤勾勒出匀称的腿部，尽管坐着，也掩盖不了她身材高挑的事实”。晚上他把黄菊英铐在铁质长椅上，“垫上枕头，铺上薄被，又把薄被卷过来，盖在她身上”，恍惚中觉得自己“是在打包一件心爱之物，似乎就要扛回家”。看似温情的笔墨，无法掩盖其从性别延伸出的权力压制，这种权力压制融入梦境，变成一场难以摆脱的追逐。然而从梦中醒来之后，警察童彤面临黄菊英，又一次产生了某种身份错位的窘迫，他“看见黄菊英在椅子上端坐着，像是等待面试的大学生”，这是一种不乏紧张但又坦然的姿态，手上铐没有锁死——那是童彤的疏忽，或者说是他面对过去难以释怀的心虚之下产生的技术误差，他慌张又意外，前一晚一直闹着请求他放她回去的女人，此刻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并没有任何要逃跑的意思。她面对童彤的疑问，淡然说道，“我跑了，你咋个办？你好倒霉的。”两人的交锋在小说中至此完结，这场最后的交锋，以童彤的完败告终，他变成了道德层面的下位者，作者至此完成了这场审判的最后一次身份互换。小说以开放式结局结尾，戒毒所的“门就要开了”，黄菊英面对未知的命运。这扇门既通向未来，也面对着过去，过去那些未曾清算的历史，那些尚未被讲述的故事，在门的开启与关闭之间，依然在寻找吐露和重建的空间。

### 《背后》：从看见到看见，失败者的小传

汤中骥在小说《背后》书写了一个失败者的故事。主人公麦冬在2012年深秋重返故乡涪城，这个四十四岁的男人带着二十年的漂泊与虚无，试图完成一场迟来的征服——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征服，更是对自我存在价值的确认。小说以“背后”为题，指向了人物关系中那些不可见的暗角与隐秘，也暗示了一代人在时代洪流中被抛掷的宿命性处境。

小说以行医与殡葬的两个家族为叙事核心，讲述了麦、高两个家族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小说最核心的叙事动力，源于麦冬父亲麦医生当年放出的狠话：“拆了你这……鬼门！”这句充满方言暴戾气息的宣言，将两个家庭的恩怨浓缩为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动作意象。“拆门”在涪城方言中意味着“踩扁”或“干掉”，是一种彻底的征服。麦医生以白大褂、听诊器的专业武装，在众目睽睽之下向高家叫阵，这一场景本身就构成了一对荒诞的生死关系——救人的医生与“发死人财”的殡葬从业者，在尊严的角斗场上短兵相接。

然而，麦医生的“拆门”誓言从诞生之初就携带着自我解构的基因，它建立在虚妄的想象之上：他声称儿子“出息大了”，却对自身家庭的真实处境缺乏基本认知。麦冬不过是个啤酒厂普通工人，月薪百来块钱，连与高秋云约会的茶餐厅消费都需精打细算。父亲的豪言壮语因此成为一座悬浮的空中楼阁，而麦冬正是被这座楼阁压垮的第一人。小说细腻地呈现了这种压迫的传递机制：当高秋云随口说出自己的挎包“几百在哪买去”时，麦冬“好不容易撑起的自尊瞬间碎了一地”。他藏起自己购买的真皮包与竹雕兔子，如同藏起一个尚未成形便已破产的自我。生活不是网络爽文，发出过豪言壮语的麦冬离开涪城远赴宣城拼搏，一开始还能节俭吝啬地不断寄钱回家，支撑起远在家乡的“出息”口碑，没想到二十年弹指过，他从青年成长为秃头油腻中年男，并没有换来臆想中的成功。而“拆门”这个符号也在长时间内处于悬置状态，既未被兑现，也无法被遗忘。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麦冬终于以油漆刷在门上写下“拆”字时，这个动作已完全丧失了当年的语境与意义；高秋云已离婚，高母黄桂兰已老去，两个家庭的矛盾和恩怨早在历史的烟尘中模糊不清。这个迟到的“拆门”，更像是一场面向虚空挥

出的拳头，一个自我安慰的仪式性动作。

汤中骥在这部小说中对主人公这对父子关系的处理，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复杂情感。麦医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父亲形象：他信奉“黄荆条子出好人”，在麦冬的成长过程中，经常施以暴力，让麦冬的成长变成残酷的蜕变。而在麦冬只能在家乡找到一个勉强糊口的工作，离“出息”还十分遥远的时候，他又能在饭桌上突然说出“你在涪城没有希望”，与儿子达成罕见的“心心相印”。他临终前执着于阻止高家参与丧事，将这场尊严保卫战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个未被明言的“坑”，是小说最引人遐思的留白。麦医生承认自己是“掉坑里了”，是“外强中干，意志薄弱”，但拒绝透露更多。结合黄桂兰的神秘造访、她对麦医生“骗子”的咒骂，以及那张从天而降的处方，读者可以隐约拼凑出一个关于情感背叛的暗线故事。黄桂兰声称麦医生承诺“身后的事由我们来操办”，这个细节暗示了两家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契约，而麦医生的临终遗嘱正是对这份契约的撕毁。

麦医生和高家的恩怨，传到麦冬这一代实际上已经十分稀薄，何况麦冬跟高秋云曾经还有过很深的情感纠缠，这让两家的恩怨萦绕着一层桃色氤氲，在小说行将结尾的部分，作者又爆出一个惊人的秘密，两家的关系似乎不仅是单纯的仇恨，早在上一代人之间，应该已经埋藏下情感关系的种子。但麦冬并没有因为这些因素就忘记父亲的嘱托，他遵守了父亲的遗嘱，象征性地完成了“拆门”的行为，他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父亲未竟的心愿。麦冬在高家黄阿姨的点化下，体认到遗传宿命的不可抗性，他意识到，“种子这东西顽固得很”，这样的认知，让他最终达成了对父亲的谅解。

小说结尾，作者给了麦冬一个貌似光明和充满希望的将来，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来自高秋云吗？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但麦冬摘下了自他返乡过后几乎未曾摘掉的口罩，露出本来面目。口罩在这篇小说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它是麦冬拒绝外界的隐形壁垒，也是他作为失败者的存在策略。摘下口罩露出本来面目的动作意味着麦冬终于完成了对自身的接纳与和解，从他的凝视中抽离出来，摆脱了对自己“失败者”的定义。从看见到看见，是从被动的、被凝视的到主动的、被自我定义的视角转换，也是在泥沙俱下的时代中，最普通的个体对自我存在的深切确认。

这三部中短篇小说，以不同的叙事路径，共同抵达了当代文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在系统与个体产生拉锯、矛盾和裂痕的过程中，人如何重新成为“人”。《且放白鹿》中，李同芳最终未能破解老伴的谜题，却在这个过程中确认了“逢场作戏”与“真实生命”的边界，技术的极限，恰恰标识出生命的不可让渡性。《门就要开了》里，黄菊英以“不逃”的姿态，将童彤从权力的幻觉中惊醒；真正的审判从不发生在法庭，而在那些未被讲述的身体记忆中。《背后》的麦冬，用二十年漂泊兑换了一个油漆写的“拆”字，这个符号的空洞化，反而成为他摘下口罩、直面自我的契机。他们用不同的人生际遇，为我们呈现出重构自我的几种可能的路径。